

如今,无论家庭或外出宴请聚会,公筷分餐大行其道,但以往国人中餐聚会,多采用围桌共食的方式,这样既显场面隆重热烈,又显热情亲密。尽管围桌共食方式已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传统,但其实分餐自古就有。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,而合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,其后逐渐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。



古代饮食方式演化:分分合合

□孙晓明

从文献记载查分餐制

从文献上的记载,我们可以寻找到古代分餐制的证据。一个是战国时期的例子,据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说,孟尝君田文广招宾客、礼贤下士,他对前来投奔的数千食客,全都平等对待,无论贵贱,都同自己吃一样的饌品,穿一样的衣裳。一天夜里,田文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,有人无意中挡住了灯光,一侠士以为这里有名堂,自己吃的饭一定与田文两样,否则就不用故意挡住光线,由此认定田文是伪君子。田文赶紧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,证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饮食。侠士知道了真相,愧容满面,当下拔出佩剑,自刎谢误会之罪。一个小小的误会,致使一位刚勇之士丢掉了宝贵的性命。试想如果不是分餐制,如果主客都围在一张大桌子“围歼”同一盘菜,怎会怀疑有厚薄之别?这条性命也就不会如此轻易断送了。这是战国时代实行分餐制的最好例证。

另一个是南朝时的例子。据《陈书·徐孝克传》说,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,并不曾动过一下筷子,没吃一口东西,可他面前的肴馔却减少了。原来徐孝克将食物悄悄藏到怀中,带回家孝敬老母了。这使皇上非常感动,下令以后御宴上的食物,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家去。这个故事证明,至少在隋唐以前,人们还维持着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。另外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顾荣有一次参加宴会,看到端烤肉的人露出想吃烤肉的神情,“因辍已施焉”,就把自己的那份餐食给了他,说明当时的宴席确是一人一份食物。

古代分餐进食的方式,伴随相应的礼节和习惯。先秦时期,礼乐制度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行为,饮食的礼仪尤为重要,《礼记》中有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”的说法。这种礼制通过食物及用具的差别来体现不同等级,采用分餐制更便于这些规范的实施。那时人们就餐是跪坐在席子上,每人面前摆放一张低矮的食案盛放餐具及食物。席子下面还会铺上“筵”。筵和席都是坐具,郑玄对《周礼》的注疏中说“铺陈曰筵,藉之曰席”,二者的区别是筵大席小,筵

下席上,后来筵席就成了宴会的代称。孔子曰“席不正不坐”,吃饭的时候,人们要规规矩矩地坐在席子上,吃自己面前的食物,这就是典型的分餐制。

小食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,沉重而器型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。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上记载:东汉隐士梁鸿,娶妻孟光,隐居霸陵山中,后来转徙吴郡给人帮工。梁鸿每当打工回来,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,并将食案举至跟眉毛齐平,捧到丈夫面前,以示敬重。孟光的举案齐眉,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。又据《汉书·外戚传》说:“许后……朝皇太后于长乐宫,亲奉案上食。”因为食案不大不重,一般只限一人使用,所以轻而易举。后来的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大有不亚于孟光的,对长辈的孝顺也有不亚于许皇后的,却很难再去举案齐眉了,小食案变成了大餐桌,弱女子又如何能举得起呢?习惯礼仪也不得不因饮食和食具方式的改变而改变,不举案了,还可双手捧碗,同样也可表达出敬重之意来。

从考古发现查分餐制

由考古发现的实物、绘画资料,同样可以找到古代分餐制的证据。汉代著名的“鸿门宴”,项王、项伯东向坐,范增南向坐,刘邦北向坐,张良西向侍。这种分餐制的场景在汉代的壁画及画像砖中均有体现。

如在河南新密市打虎亭汉墓出土的描绘宴会场面的壁画中——人们席地而坐,每人面前摆放着一张食案。在发掘出的汉墓壁画、画像石和画像砖上,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、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,却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进餐场景。低矮的食案是为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来设计的,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,出土了不少食案实物,以木料制成的为多,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。汉代呈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,或圆或方,有实物出土,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。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,便是案,正如颜师古在《急就篇》注所说:“无足曰盘,有足曰案,所以陈举食也。”

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,最晚在史前时代末期便已发明。考古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的木案实物,虽然

木质已腐朽,但形制还相当清晰。

考古工作者1978—1980年在发掘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时,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。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,长约一米,宽约三十厘米。案下有木条做成的支架,高仅十五厘米左右。木案通涂红彩,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。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,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,有杯、觚和用于温酒的罍。稍小一些的墓,棺前放的不是木案,而是一块长五十厘米的厚木板,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。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,也是长方形,略小于木案。俎上放有石刀、猪排或猪蹄、猪肘。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,可以想象,当时擅长烹调的主妇们,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,木俎最高不过二十五厘米。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,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,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,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。

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,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四千五百年以前,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出现的源头,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我们提到的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不过可以肯定,比陶寺文化居民更早的饮食活动,并不依赖木案的使用,史前先民或许根本没想到吃饭还要用什么案子,或者最简陋的木板也没有用上。

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里,“天下为一家,而无私织私耕,共寒共寒,共饥共饥。”《尉繚子》人们遵循一条共同的原则:对财物共同占有,平均分配。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,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,食物烹调好了以后,按人头平分,没有厨房和饭厅,也没有饭桌,各人拿到饭后都是站着或坐着吃。饭菜的分配,先是男人,然后是妇女和儿童,多余的就存起来。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,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虽有本质的区别,但在渊源上考察,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。

从食案坐具查合食制

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,而合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,其后逐渐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。周秦汉晋时代,分餐制

之所以实行,应用小食案席地而坐进食是个重要原因。虽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小小的食案阻碍了饮食方式的改变,但如果食案没有改变,饮食方式也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。

西晋王朝灭亡以后,生活在北方的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,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,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。频繁的战乱,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,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、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,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。杨泓先生通过家具史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:正是这种新的历史背景,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,传统的席地而坐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改变,常见的跪姿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,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。公元5—6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、方凳、胡床、椅子,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,“席不正不坐”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
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,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图形,极其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有的蹲跪姿势,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,这显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时可能出现的现象。不过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,人们又看到坐胡床(马扎子)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。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,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。

到了唐代,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,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,人们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,这时再用低矮的食案吃饭就非常不方便了。因此,高足的餐桌应运而生,称为“食床”。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,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在椅子上的墓主人像,双足并排放在地上,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。可以肯定地说,在唐代,至少在唐代中晚期,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,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历史性改变,为众人围坐会食共食提供了契机。

这一时期的壁画中出现了很多使用高桌高椅进餐的场景,如敦煌473窟壁画中,就描绘了九个人坐在长方形餐桌两侧就餐的场景。宾客共同坐在一个食床旁进食,但主要的菜肴和食物是由厨师或仆人“按需分配”的。只有饼类等主食或羹汤才合餐。在晚唐五代之际,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,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,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。这幅长卷中,绘有韩熙载及几个贵族子弟,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,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。他们面前摆着几张桌子,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,是用8个盘盛着的果品和佳肴。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用具,互不混杂。

这里似乎表现的不是用餐方式,而是贵族们怀古幽思心绪的一种显露。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束力还是很强的,因此说从分餐到会食有很长的过渡阶段,这何尝不是当今会食、共食聚餐气氛下的分餐制呀。



汉代漆食案



打虎亭汉墓宴饮图局部



唐代韦氏墓壁画《野宴图》